

当前财政问题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文选



中国财

经济出版社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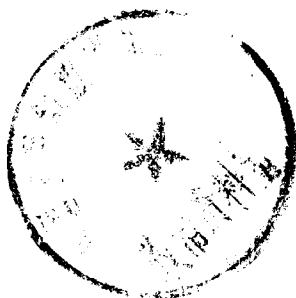
429684



当前财政问题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文选

中国财政学会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当前财政问题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文选
中国财政学会 编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海淀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70,000 字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

统一书号：4166·300 定价：0.75 元

编 者 的 话

中国财政学会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六日，在昆明市召开了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现将会上部分发言和论文选编出版，以资交流。因篇幅所限，谨向其他提供了论文的同志致歉！

此次文选拟分三册按专题成书。书名定为《当前财政问题》、《论财政分配与经济的关系》和《论财政制度改革》。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交流成果 探索真理

陈如龙同志在中国财政学会1980年年会和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1)

围绕经济调整 开展理论研究

陈如龙同志在中国财政学会1980年年会和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闭幕词 (5)

当前财政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许 毅 (13)

对六十年代三年调整中财政银行工作的

几点感受.....左春台 (35)

综合财政在国家干预经济中的作用.....沈 云 (51)

综合财政浅谈.....苏 挺 (71)

谈财政银行工作中一些认识问题.....邓子基 (95)

正确认识商品性质是财政干预经济的前提.....贾广祺 (105)

* * * *

坚持财政收支平衡, 消灭财政赤字.....千家驹 (122)

关于财政赤字问题的探讨.....王绍飞 (128)

财政赤字初议.....陈 共 (137)

关于财政赤字的一些问题.....黄菊波 (150)

关于预算赤字的几个问题.....苏挺、何行道 (167)

浅谈预算赤字问题.....刘永祯 (177)

* * * *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纪要.....〈财讯〉 (190)

交流成果 探索真理

陈如龙同志在中国财政学会1980年年会和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中国财政学会1980年年会暨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现在开始了。

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以来，财政界第二次规模盛大的理论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财政学会的理事，有财政经济主管部门的代表，财政经济理论战线的代表和高等财经院校及部分综合大学的代表，共235人。不少财政界的老前辈、领导干部和著名学者在百忙中接受邀请前来参加会议。我谨代表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向到会的全体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云南省人民政府、省财办、财政厅、昆明市人民政府、市财政局热情地为会议安排了很好的条件。云南省副省长杨克诚等领导同志亲临大会指导。我谨代表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和会议全体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会议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召开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会，总结一年来的学会工作，制定1981年学会活动计划；一个是交流财政理论讨论成果，对当前重大的财政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展讨论。

中国财政学会成立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组织和推动财政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3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财政学会或学会的筹委会，有23个省、

市、自治区成立了财政研究所或研究室。在中国财政学会的组织推动下,召开了财政学研究会、财政体制和综合财政研究会、外国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理论讨论会、企业财务体制研究会、城市财政研究会、成本研究会、奖金与经济核算研究会,紧密结合实际开展了专题讨论。财政史研究会也就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召开了三次研究会。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如同中国会计学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中外合资企业会计讲习班等。一年来财政学术研究活动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财政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在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我们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财政研究从经济入手,提出和初步探讨了财政分配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关系,财政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财政对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的形成和使用的调节作用,综合财政平衡等问题。现在看来,围绕贯彻“八字”方针,开展财政理论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今年以来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大家的努力和各种专题研究会,进一步探讨了财政赤字的形成、危害和消灭赤字的措施,财政的职能作用,综合财政的内容、范围及其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重要作用,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三大平衡的理论方法,财政分配制约积累率的理论方法,比例、平衡、效果、速度的关系,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以及国民经济成本管理与企业成本管理等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使我们的财政理论研究同国民经济宏观效果的研究,更进一步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当前的财政理论研究,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四化”建设的要求,还是有不小距离的,有许多新的问题,正等待着我們进一步深入探讨,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收到了初步效果。工业生产的完成情况也是好的。今年1至9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1.7%,到年

底预计可增长7%以上，其中轻工业产值可以增长16%以上，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市场比较活跃。这是人们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在看到好的形势的同时，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经济被动局面没有扭转过来，而且还潜伏着一种危险。这些问题和潜伏着的危险主要是：我们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情况，现在还没有调整过来，特别是能源不足和能源本身比例失调的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在分配方面，上了消费，积累下得不够，这就使得积累与消费的总额超过了国民收入的总额，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加上今年农业受灾减产，以致国家财政预算在1979年出现170.6亿元较大赤字的基础上，今明两年的赤字有突破原定预算和概算的现实危险。国民经济中的这些问题，固然是经济工作中长期“左”倾思想形成的，但是应当说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是密切关联的。两年来，从理论界到实际部门在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上，在如何进行调整与改革的问题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中央早已明确调整是关键，但是在执行中，往往强调改革多，对调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贯彻不力。讲市场调节作用多，谈国家计划调节少，甚至有的否定必要的行政干预；讲局部利益和把微观经济搞活多，谈全国一盘棋和宏观经济的效果少。总之是没有认真处理好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不是改革促进调整，而是用改革来代替调整。讲调整，又是原则讲的多，具体措施少。在压缩基建规模方面，往往是预算内的压了，预算外上；预算拨款压了，银行贷款上；基建项目压了，用技术措施项目上；国内项目压了，用进口项目上。在建设项目上，又往往是长线多，短线少；加工工业多，能源交通少；以致基建战线越拉越长，重复建设越搞越多，经济效果越来越差。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但经济建设将继续处于打消耗战的徘徊状态，而且由于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过多，将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进而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这种情况从

局部看是不容易看清楚，必须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向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人民讲清楚，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全局主动了，稳定了，局部才能站得住，要把局部利益同扭转全局的被动结合起来。

最近，中央和国务院讨论了经济形势，研究了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和潜伏着的危险，重新明确：贯彻“八字”方针，调整仍然是关键。今明两年要突出的抓调整，稳定经济。整个经济工作，要以调整为中心来安排。调整的中心环节是要进一步解决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同时适当控制消费的增长。在指导思想，要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搞活经济的同时，必须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在很多经济措施、经济杠杆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国家尤其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这是中央对经济问题的重要决定。经验证明：危险不在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在于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不认识或者认识不足。我们相信，在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一定会较快地克服前进中的问题和困难，经济形势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这次财政理论讨论会应当本着中央这一精神，进一步总结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前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包括财政赤字问题、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及其调整问题、加强综合平衡问题、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调整的协调问题等，进行理论探讨，使我们的财政理论研究，提到一个新的水平，更好地为正确贯彻“八字”方针服务。

同志们，我们这次理论讨论会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狠抓调整，稳定经济的时刻召开的。希望我们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展示一年来财政理论研究成果的大会，学术交流的大会，探索科学真理的大会。到会的同志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较高的理论素养，会前有各种专题研究会的充分准备，带来一百四十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我们相信，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开好这次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围绕经济调整开展理论研究

陈如龙同志在中国财政学会1980年年会和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闭幕词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最近中央和国务院重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调整是关键,今明两年要突出地抓调整,稳定经济,调整的中心环节是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会议针对1979年国家预算出现170亿元赤字,今明两年的预算和概算还连续有赤字的情况,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围绕财政赤字展开了理论讨论,并进而探讨了分配结构同经济结构的关系,调整同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及综合平衡、财政职能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通过探讨,使我们认识到积累率过高、比例失调和财政赤字是长期“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造成的恶果;认识到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内在联系;认识到调整国民经济,既包括调整比例关系,也包括恢复国力与建设的平衡,必须在国力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调整,以及在当前阶段改革必须服从调整并有利于调整等等。这些都标志着这次讨论会在理论研究上的重大进展。

现在,我就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些简要的概括,以利于会后继续深入研究。应当说明,这种概括只是为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搭个阶梯,不是结论。

关于财政赤字问题

会议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了 1979 年以来发生赤字的原因、危害和克服的办法。代表们认为，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在建国初期就提出来了。它是以量力而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在长期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违之有害的正确方针。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盛行的所谓“积极平衡论”和“缺口平衡论”等错误观点，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中全会以前，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而又要求大干快上，都使这条方针受到冲击。这两年财政连续发生赤字，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正是长期延续下来的“左”倾思想在财政上的反映。

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当奉行赤字财政政策。赤字终究会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应当对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地研究，决不能盲目搬用。这是在讨论中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于对 1979 年、1980 年发生的财政赤字应当如何评价，看法不尽相同。

一种意见认为，对这两年连续发生赤字是否有害要具体分析，不要绝对化。“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不搞赤字，国民经济受害更大，在市场上不出现抢购的条件下，搞点赤字也是允许的。当然，这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允许的例外，并不是主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打赤字预算。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战争、灾荒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和主观上的失误，出现财政赤字也有其必然性。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主观指导思想说，必须坚持“当年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建国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各项资金分配比较合理的时候，我国经济

就顺利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反之，经济发展就缓慢，甚至停滞倒退。财政赤字是对国民收入的过头分配。赤字无害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财政赤字最终是要由人民来承担的。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和财政学都必须受实践检验。事实上用赤字搞基本建设，是盖不起厂房宿舍的，用赤字提高人民生活，也只是画饼充饥。这是人所共知的。当然，要把作为一种政策的赤字财政同实际执行中偶尔出现的财政赤字加以区别。要把赤字数额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由此带来的程度不同的危害加以具体分析。至于出现赤字是否有必然性，应当说，客观上有难以预料和不可抗拒的偶然事件，主观上也有计算失误的可能。因此，在个别年度预算执行中发生一点赤字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只要始终一贯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国家有必要的后备力量，那么个别年份发生赤字是不难弥补的，不难在下一个年度加以调节的。1979、1980年连续发生很大赤字，是十年动乱以及“左”倾思想继续危害，把后备挖空所造成的后果。不能认为它的发生有什么必然性。连续出现赤字，增发票子，最后引起市场物价上涨，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取得的调整和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使已经扩大的企业自主权和人民生活已经得到的改善付诸东流，不仅将再次出现国民经济的反复折腾，而且将进而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

有的同志提出：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搞赤字财政，经济发展较快，我们为什么不能搞点赤字呢？这正是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在一定时期发展较快是事实，但也正由于分配过头，搞了赤字财政，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阻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应当防止的。即以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尽管凯恩斯主义在一定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它带来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使它们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关于经济结构与分配结构的关系问题

代表们认为，1979年以来，连续发生赤字直接的原因是分配过头，但根本原因则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例失调的根子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即基本建设投资方向的错误和规模超过国力，而投资结构不合理和规模超过国力又是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的产物，以致造成经济效果下降，财力削弱的后果。因此，解决赤字问题必须双管齐下。既要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合理比例关系问题及经济结构问题，也要解决积累过高以及积累、消费分配总额突破国民收入总额，造成财政、信贷、物资、外汇不平衡的问题。

至于分配结构的探讨，如果说去年佛山会议只是提出了问题，引起了重视，那么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经验，又大为前进了。表现在：（一）经济结构与分配结构的相互关系，认为前者对后者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后者对前者也可以发挥能动的反作用，或者说起调节作用。例如改变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用于发展轻纺工业、建筑材料工业以及煤、电、油、运，这对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影响。（二）把调整分配结构同国力和建设的平衡联系起来，即是说，调整分配结构必须量力而行，必须在国力范围内搞调整。如果用打赤字预算的办法增加某些部门的投资，那就必然破坏国力和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使整个社会再生产陷于混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三）涉及到地区的分配结构，探索的深度和广度都前进了一步。当然，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时间还短，许多问题还有待继续探索和深化。

关于加强综合平衡

大家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早已为陈云同志所倡导，

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科学的原理，六十年代初我们就曾编制过综合财政计划，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综合平衡始终搞不好，综合财政计划也不能坚持呢？原因在于“左”倾思想的干扰，阻碍人们把正确的理论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时也由于在组织上没有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没有指定一个部门把这件事管起来。

代表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加强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综合平衡十分重要。在财政发生大量赤字的情况下，有人主张财政亏空信贷补，国力不足外债补。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必须从综合平衡的角度慎重对待。

有的同志认为，如果银行在保证正常的信贷资金需要以后确实还有富裕，国家可以抽调银行资金，或者由财政向银行取得长期贷款，这时银行就不能再把这笔钱贷放出去，搞“一女二嫁”。但是用这种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短暂的权宜之计。三年“大跃进”，银行资金紧张，财政似乎日子好过。当前，财政出现大量赤字，银行似乎日子好过，实际上都是一时的假象。1979年银行信用膨胀，发行过多，如果不认清事情的实质，认为银行“有的是钱”，存贷两旺，不需要配合调整抽紧银根，相反还可以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性的放款，那是很危险的。代表们还认为，对划清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界限，区别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供应渠道的管理经验不应否定。一定的灵活和交叉是可以的，但基建资金渠道太多，没有一定的数量限制，对有效地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是有害的。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利用一定的外国借款，这是好事，但是必须十分重视外汇收支平衡及其与财政收支平衡的关系。过犹不及。闭关自守是错误的，但举债必须考虑偿还能力和资金回收期限，考虑国内配套的财力可能，无限制借债也不足取。目前我国借外债有国家统借统还和地方企业自借自还两种，因为归还外债都必须用企业创造的利润来归还，这同国家财政收入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借款应当通过各级财政，借款单位应向各级财

政申报贷款数额、偿还方式、偿还计划和进度，以便组织地区的和全国的外汇收支平衡。

代表们还认为，国家财政在综合财政计划中始终居重要地位。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不会因扩大企业自主权而缩小。越是扩权，越需要加强国家财政对各种资金的管理和综合平衡，其途径就是通过综合财政计划。有了综合财政计划，国家财政的作用就不仅不会由于财权下放而削弱，反而可以使它解脱一部分烦琐的具体业务，更好地发挥其组织综合平衡，加强监督和调节作用。

关于综合财政这个范畴，应当如何理解，代表们也作了有益的探索。有的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的认为它是财政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的把综合财政和综合计划等同起来，总之在概念和内含上还有待深入探索。薄一波同志的“综合财政也是科学”的题词，给我们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课题，我们应继续努力钻研。

关于调整改革的关系

在讨论中，对调整改革的关系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强调调整，只有调整好了，才能为改革创造条件。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强调改革，因为只有把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才能发展，才有利于促进调整。第三种意见认为，调整改革互相促进，可以并行不悖，不应有先后之分。

经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和平衡问题，改革所涉及的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在当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产业结构很不合理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全局即宏观经济就搞不活。即使地区、企业局部——微观经济搞活了也还是调整不过来的。所以调整是关键，是中心，是全局。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否定两年来改革的成果，更不是说改革可以不搞。调整与改革既有相辅相成的

方面，也有互相矛盾的方面。应当总结试点经验，具体部署，妥善安排。先搞相辅相成的部分，有矛盾的问题最好放到调整大体就绪时再解决。实际上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进行大的改革的。把两者对立起来，或者把两者平列起来都是不对的。同时要消除对改革的一些误解，如认为扩大自主权，就是扩大财权，其实仅仅扩大财权是不行的。这有一个各项经济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在改革中，主要是调动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果的积极性。即处理好事权、权责、权益的关系。而处理这些关系的前提则是国家多得，企业、职工也有所得。在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不能用减少国家收入的办法，而应当在尽量不分散财力的前提下，把改革推向前进，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在当前，消灭财政赤字，维护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正是为了维护改革的成果，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利益，正是为将来进一步改革打基础。

此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代表们还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践的基础上就已经提出来了。为什么不为大家所掌握而使国民经济屡遭挫折呢？这说明我国的上层建筑不完善，有缺陷，因而，让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个人专断占了统治地位，在经济战线上形成了“左”倾错误。为此，代表们认为在改革经济的同时，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人民群众及其代表机构对行政机关发挥真正的监督作用，使个人专断和瞎指挥等弊病没有滋生的土壤，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遵循客观规律的轨道健康发展，不再折腾。

以上就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这次理论讨论会，说明了我们的财政理论研究在新形势下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和财经工作的客观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在国民经济调整和

四化建设的实践中，情况在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作出回答。我们应加倍努力。

这次会议同佛山会议一样，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气。我们紧紧围绕调整国民经济这个主题，开展理论研究，为指导实践，提出自己的主张，希望对国事有所裨益。尽管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是应当坚持的。这次会议确认，佛山会议制定的研究课题规划，方向是正确的，内容也是比较全面的，可行的，应该作为我们继续奋斗的目标。我们希望同志们在1981年度，围绕规划中提出的课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我们还殷切希望各地区迅速建立、健全学会的组织，使其成为组织推动财政学术活动的中心，并与当地财政部门密切配合，把各种学术活动积极开展起来，按照规划开好各种专题研究会。我们深信，在学会的组织推动下，财政战线的广大实际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必将进一步加强协作，群策群力，发扬成绩，克服前进中的缺点，为繁荣财政学术研究作出更大努力，以丰硕成果迎接下届年会的召开。

（本文略有删节）